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胡洪曙 李 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 2008—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关键词: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税收努力;企业税负不平等;税负痛苦指数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3)02-0052-1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2016—2021 年减税降费累计超 8.6 万亿元,宏观税负由 2012 年的 18.7% 降至 2021 年的 15.1%,降幅达到 3.6 个百分点^①。一般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税负并不算高^[1]。但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处于较高水平。在减税降费大背景下,“宏观税负较轻,而企业税负痛感较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宏观税负和微观企业税负的测度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我国税负主要由企业承担,企业间税负存在不平等^[2]。尽管当前宏观层面的税负较轻,但是部分企业税收负担过重而另一部分企业税收负担过轻,税负加总的过程掩饰了企业税负不平等^[3]。由此可以看出,微观企业税收负担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也存在于同一行业、同一产权性质、同一地区的企业之间。“不患寡,而患不均”,强烈的对比心理促使高税负企业感受到更大的税负痛感。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间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过大产生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较大会导致相同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加成率离散度增大,进而导致行业内部的资源错配^[3],最终造成了社

收稿日期:2022-10-30

作者简介:胡洪曙(1973—),男,湖南桃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捷(1996—),男,江西赣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

会总生产率的无谓损失^{[4][5]}；从微观层面来看，承担过重税收负担的企业面临着严格的融资约束^[6]，导致企业的现金流压力进一步加剧，进而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7]，最终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高税负企业会参照低纳税遵从度企业，滥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盈余管理和内幕交易等手段来减轻实际税负，导致企业纳税活动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在经济增长动机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会采取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手段以吸引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入辖区，而在此过程中，由于作为财政竞争主要手段的税收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的差异，财政竞争会改变企业的税负水平，从而影响企业间的税负不平等状况。国内外鲜有直接研究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影响的文献，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税负不平等存在性及测度方法研究。大多文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分析不同所有制类型^{[8][9]}、不同产业^[10]、不同地区^{[11][12]}和不同行业^[12]的企业之间的税负存在差异，从而间接表明企业之间存在税负不平等。从国内外经典文献来看，目前企业税负不平等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数列分析法、税负差异系数法、税收协调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法、变异系数法、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Theil Index)法，比如蒋为使用基尼系数法测度企业增值税税负差异^[13]，倪红福等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度企业税负不平等^[2]。第二，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税收竞争相关研究大部分基于同质化的地区竞争假设，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采取改变税收征管力度的方式直接影响企业实际税负，或者通过影响企业避税行为来间接影响企业税负^[14]。少数文献关注到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异质性影响，杨龙见和尹恒从地方政府异质性约束角度解释企业实际税负的分化水平，指出不同地区间差异化的税收竞争策略会导致企业实际税负不同^[15]。第三，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我国财政支出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重的支出责任，同时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会增大财政压力，进而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以筹集更多企业税收，最终提高企业税负^{[16][17]}。

上述文献为企业税负不平等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较少使用定量方法度量上市公司的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没有深入研究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尤其是较少文献从财政竞争的角度探讨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本文使用基尼系数度量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总体税负不平等程度，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最近时期上市公司的税负不平等情况，为研究企业税负不平等影响因素等问题奠定基础；第二，从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角度研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丰富了财政竞争影响后果和税负不平等成因的有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我国税制结构下，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较高，是企业缴纳税收较多的两个重要税种。基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中央政府制定了较多针对中小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②，这使得中小企业相对大型企业总体税负较轻。同时，由于税收征管能力受到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和地方财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地方政府普遍重视重点税源建设以达到便捷获取税收收入的目的，这使得税收遵从度较高的重点税源企业承担较重的税收负担^[18]。综上可知，我国税制结构和重点税源建设，以及企业的逃税和盈余管理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企业间税负差距。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一）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竞争的方式包括实施税收优惠和降低税收努力，进而对企业税负不平等产生影响。一方面，税收优惠会产生直接的节税效应。税收优惠方式通常指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的税收返还或者差别化税率政策^{[8][19]}。由于重点税源企业相对来说更能够发挥招商引资、促进就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些企业也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照顾，在地方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相比中小企业，重点税源企业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税负水平。此时，税收竞争缩小了同一地区企业间的税负不平等。另一方面，降低税收努力会产生明显

的节税效应,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重点税源企业税收缴纳较多、税收遵从度较高,并在带动产业链发展、提高本地经济活力方面贡献较大,一般会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照,能够在税收征管强度调整中获得更多收益。因此,地方政府采取降低税收努力方式进行税收竞争时,地方政府对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有望实现更大幅度下降,而对非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进而缩小了企业税负不平等。现有研究认为,由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一般统一由中央制定,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定税收优惠,以及国务院及其财税主管部门依法制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地方政府只具有税收执行权。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清理规范^③,这些政策有效抑制了地方政府通过不规范的税收优惠开展税收竞争。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出台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竞争的空间愈发有限,而改变税收努力的手段更为隐蔽,且难以被上级政府有效监管,因此地方政府主要采取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进行税收竞争^[14]。基于此,本文从税收努力的渠道检验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税收竞争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从而在客观上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

(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地方政府开展财政支出竞争的方式包括提高税收努力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进而对企业税负不平等产生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张财政支出规模,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在面临更大财政压力时增大税收努力程度。地方政府强化重点税源企业税收征管力度较为便利,且能够获取的税收规模较大。同时,当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时,重点税源企业作为当地纳税大户一般会成为地方政府重点干预和游说的对象,往往会面临着更大的税收征管强度,产生了“鞭打快牛”的现象。因此,地方政府采取提高税收努力方式以满足财政支出竞争的资金需求时,地方政府对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而对非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提升幅度相对较小,进而扩大了企业税负不平等。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即能够提高企业依法纳税的程度。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采取财政支出竞争的策略以吸引资本进入,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努力改善软性营商环境。由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可观测性更强,上述措施会提高企业的主动税收遵从度,而财政支出压力下税收稽查力度的加大也会提高企业的被动税收遵从度。相对非重点税源企业,重点税源企业税收遵从度较高,提升空间较为有限。因此,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的积极作用在非重点税源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这缩小了企业税负不平等。然而现有研究认为,随着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能力明显提升和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大量运用,企业税收遵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显著降低^[20],因此地方政府主要采取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进行财政支出竞争,总体上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基于此,本文从税收努力的渠道检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从而在客观上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

(三)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会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不同而存在差异。企业的纳税遵从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时,企业现金持有量不足,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等行为将受到制约。在此情形下,企业会降低纳税遵从度,有强烈动机通过逃避税行为来减少税收支出和增加现金持有量,以达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相比低融资约束企业,逃避税动机更为强烈的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异更大,从而具有更大的税负调节空间,因此当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努力来进行税收竞争时,高融资约束企业税负的整体差异收窄程度会更大。而且根据税收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税收竞争会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从而降低企业逃避税行为的边际收益,进而促使高融资约束企业减少逃避税行为,在此情形下高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将会更大幅度地降低。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进行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企业税负,

高融资约束企业税负的上升幅度相较于低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这使得高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将会更大幅度地上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融资约束越强,税收竞争对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和财政支出竞争对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越显著。

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政治关联、高管身份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国有企业与政府间政治关联较为紧密,承担着稳定经济、解决就业和提供稳定税收收入的政治任务,这使得国有企业不仅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也要兼顾承担社会责任的非经济目标。其次,大多数国有企业高管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国有企业高管的“准官员”身份使得国有企业高管的经营决策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与之相对,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多为企业原始股东、职业经理人或家族成员,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具有特殊的政治关联及其高管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努力时会优先考虑国有企业,也就是说,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税负受到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努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当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努力来进行税收竞争时,在地方政府“父爱主义”的保护之下,国有企业税负的整体下降幅度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这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实现更大幅度地降低。当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来进行财政支出竞争时,地方政府会将财政压力传导给存在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尤其是税收贡献较多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而导致国有企业整体上升幅度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这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实现更大幅度地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税收竞争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和财政支出竞争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承担的税负主要来自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大税种。主要针对增值税发票管理的金税一期、二期工程加强了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逃税行为的管理,并且通过“以票控税”的方式提高了企业增值税的税收遵从度。金税三期工程则进一步提高了税收遵从度和落实了税收优惠,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增值税税负^[21]。而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主要采用“查账征收”的方式,企业可能与税收征管人员合谋以调整费用扣除和资产损失等以降低企业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22]。由此可见,增值税目前已经得到较为规范的监管,而企业所得税仍然存在较大的监管难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努力的行为对企业所得税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当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努力来进行税收竞争时,企业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整体下降幅度会大于增值税税负,从而使得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程度会更大幅度地降低。同理可得,当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来进行财政支出竞争时,企业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整体上升幅度会大于增值税税负,从而使得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程度会更大幅度地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与增值税相比,财政竞争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的作用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30个省级层面(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财政数据和企业层面财务数据。企业层面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税收相关指标来源于2008—2020年《中国税务年鉴》和各省税务统计年鉴,财政相关指标来源于2008—2020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财政统计年鉴,部分手工整理自各省2020年省级财政决算报告。市场化指数来自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并与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为减少原始数据中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ST企业;(2)剔除企业税负、营业收入为负的企业;(3)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最终得到的样本数据包括390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1. 财政竞争与企业税负不平等。为了检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构建实证模型(1):

$$\text{Inequl}_{pt} = \beta_0 + \beta_1 \text{Taxc}_{pt} + \beta_2 \text{Expc}_{pt} + \gamma X_{pt} + \mu_p + \eta_t + \epsilon_{pt} \quad (1)$$

式(1)中, Inequl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 Taxc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的税收竞争, Expc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的财政支出竞争, X_{p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p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η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ϵ_{pt} 表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 β_1 和 β_2 , β_1 衡量了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边际影响, β_2 衡量了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边际影响。

2. 财政竞争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分析。根据理论分析,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以往文献表明,税收竞争会降低税收努力,而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税收努力^[16],因而本文实证主要检验税收努力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构建实证模型(2):

$$\text{Taxburden}_{pit} = a_0 + a_1 \text{TE}_{pt} \times \text{Big}_{it-1} + a_2 \text{Big}_{it-1} + a_3 \text{TE}_{pt} + \gamma X_{pit} + \mu_i + \eta_t + \epsilon_{pit} \quad (2)$$

式(2)中, Taxburden_{pit} 表示 p 省份内企业 i 第 t 年的实际税负; TE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的税收努力; Big_{it-1} 表示企业 i 第 t-1 年是否为重点税源企业,当企业 i 上年度为重点税源企业时,则有 $\text{Big}_{it-1} = 1$, 否则为 0; X_{pit} 表示一系列反映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密集度、资产负债率、雇佣人数和总资产周转率;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η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ϵ_{pit} 表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 a_1 和 a_2 , a_1 衡量了相对于非重点税源企业,税收努力的变化对重点税源企业实际税负的相对效应, a_2 衡量了在税收努力不变情况下,重点税源企业相对于非重点税源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异。根据理论分析,税收努力发生变化时,重点税源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幅度显著大于非重点税源企业,因此预期 a_1 显著大于 0; 税收努力不变时,重点税源企业实际税负大于非重点税源企业,因此预期 a_2 显著大于 0。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企业税负与企业税负不平等。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各项税种的征收过程均有影响,因此,企业税负应当是综合考虑各项税种之后的企业实际税负,衡量方式为:(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8]。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指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指的是企业从税务机关实际收到的全部税费返还。因此,本文可以用两者之差度量企业当期发生的税费净支出。根据定义,企业税费负担指的是实际缴纳的各项税费占计税依据的比重。由于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等税费的计税依据并不一致,考虑到营业收入是企业计税依据的主要来源,本文选取营业收入作为税费负担变量的分母。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基尼系数对企业税负不平等进行测算和分析,原因在于,相比较大部分相对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值具有经济学含义^[23];基尼系数在度量不平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够快速简洁地测算不平等程度。借鉴蒋等为对增值税不平等程度的测算方法^[13],本文构建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的测算模型如下:

$$\text{Inequl}_{pt} = \frac{1}{2 N_{pt}^2 u_{pt}} \sum_{a=1}^{N_{pt}} \sum_{b=1}^{N_{pt}} |\theta_{apt} - \theta_{bpt}| \quad (3)$$

式(3)中, Inequl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a 和 b 为 p 省份第 t 年任意两个企业, θ_{apt} 和 θ_{bpt} 分别表示 p 省份内的 a 企业和 b 企业第 t 年的企业税负, N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企业总数, u_{pt} 表示 p 省份第 t 年企业税负均值。

2. 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包括税收竞争(Taxc)和财政支出竞争(Expc)两种方式。本文使用地方税收除以当地 GDP 度量税收竞争。为方便解读实证结果,本文对税收竞争指标进行取负数处理,此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手段参与财政竞争的程度越高。本文使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除以当地 GDP 度量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支出竞争指标越大,

说明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支出手段参与财政竞争的程度越高^[24]。

3. 税收努力。本文理论分析表明, 税收竞争主要体现为降低税收努力, 而财政支出竞争主要体现为提高税收努力, 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变化会改变企业间税收征管强度, 进而对企业税负不平等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对税收努力进行测算。参考主流文献的度量方法, 本文采用“税柄法”测算潜在税收收入, 采用实际税收收入与潜在的税收收入之比来测度税收努力^[25], 该值越大, 意味着税收努力程度越高。由此, 构建税收努力的测算模型如下:

$$\frac{\text{tax}_{pt}}{\text{gdp}_{pt}} = \alpha_0 + \alpha_1 \text{pergdp}_{pt} + \alpha_2 \frac{\text{open}_{pt}}{\text{gdp}_{pt}} + \alpha_3 \text{popden}_{pt} + \alpha_4 \frac{\text{indus2}_{pt}}{\text{gdp}_{pt}} + \alpha_5 \frac{\text{indus3}_{pt}}{\text{gdp}_{pt}} + \alpha_6 \text{urban}_{pt} \quad (4)$$

$$\text{TE}_{pt} = \left(\frac{\text{tax}_{pt}}{\text{gdp}_{pt}} \right) / \left(\frac{\text{tax}'_{pt}}{\text{gdp}_{pt}} \right) = \frac{\text{tax}_{pt}}{\text{tax}'_{pt}} \quad (5)$$

式(4)和式(5)中, tax_{pt} 、 gdp_{pt} 、 pergdp_{pt} 、 open_{pt} 、 popden_{pt} 、 indus2_{pt} 、 indus3_{pt} 、 urban_{pt} 、 tax'_{pt} 分别表示 p 省份第 t 年税收收入、GDP、人均 GDP、进出口总额、人口密度(各地常住人口/土地面积)、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潜在税收收入。本文先对式(4)进行回归, 计算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再计算出潜在税收收入(tax'_{pt})占地方 GDP(gdp_{pt})的比重, 最后根据公式(5)测算出税收努力 TE_{pt} 。

4. 重点税源企业变量。本文使用企业上年度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总和来衡量企业纳税总额, 并以此作为重点税源企业的判断标准。参照税务机关做法, 本文根据该企业上年纳税总额排名是否处于一定比例作为重点税源企业。为了保证重点税源企业样本充足, 且不因划分比例过高导致非重点税源企业误作为重点税源企业, 本文以纳税总额排名前 30% 为标准划分重点税源企业, 并删除中间档次企业。

5. 控制变量。本文在参考吴祖光和万迪昉、陈冬等以及邓晓兰和金博涵的研究基础上^{[26][27][28]}, 引入反映地区特征和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 财政压力和产业结构都是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也会对企业税负造成影响, 本文采取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 该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在政府干预、产品市场、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以及法治环境等维度的总体状况, 地区市场化指数越高意味着地区制度越完善, 这能够有效规范企业行为, 从而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差距。对此, 本文反映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压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自身特征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但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26]。企业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等特征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和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此, 本文反映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和雇员规模, 并计算出各省份企业之间在企业特征方面的方差。各变量定义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含义及计算公式
企业税负不平等	Inequl	0.425	0.076	0.909	0.122	企业税负的基尼系数
税收竞争	Taxc	-0.087	0.028	-0.043	-0.181	税收收入/GDP(取负数)
财政支出竞争	ExpC	0.257	0.114	0.758	0.1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财政压力	Fiscal	1.300	1.001	5.744	0.06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产业结构	Indus	0.454	0.084	0.590	0.186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市场化水平	Market	6.422	1.906	10.83	2.330	市场化指数
企业规模差异	Size	1.864	1.046	6.458	0.216	年末资产总额对数的方差
资产负债率差异	Lev	0.041	0.013	0.119	0.010	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的方差
资产收益率差异	Profit	0.005	0.006	0.059	0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的方差 其中, 平均资产总额 = (资产期初余额 + 资产期末余额)/2
雇员规模差异	EmPLY	1.853	0.818	4.346	0.561	雇佣人数对数的方差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企业税负不平等最高为 0.909,最低为 0.122,平均值为 0.425,标准差为 0.076,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平均值高于 0.4 的“警戒线”,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整体偏高。税收竞争的最大值为-0.043,最小值为-0.181,平均值为-0.087。财政支出竞争的最大值为 0.758,最小值为 0.110,平均值为 0.257。这说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均存在较大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实证模型(1)检验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列为未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以及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列为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并加入省级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4)列为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且加入省级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税收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收竞争显著降低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而财政支出竞争显著扩大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结果符合本文的预期,验证了假设 H1 和假设 H2。

从表 2 第(4)列回归结果看,财政压力和产业结构系数不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压力和产业结构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不明显。市场化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区较高的市场化水平能够有效缩小企业间税负不平等。企业规模差异系数显著为负,资产收益率差异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游说地方政府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这降低了其本身较高的税负水平,进而缩小了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资产负债率差异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能够通过债务的税盾效应降低企业税负,这降低了其本身较高的税负水平。雇员规模差异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企业雇员规模越大,企业越有可能受到更为严格的税收监管,这使得其与雇员规模较小企业的税负水平拉大,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等程度提高。

表 2 财政竞争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nequI	InequI	InequI	InequI
Taxc	-0.373 ** (0.165)	-1.210 *** (0.449)	-0.824 *** (0.293)	-0.728 *** (0.272)
Expc	0.171 ** (0.074)	0.418 ** (0.196)	0.344 ** (0.151)	0.357 ** (0.163)
Fiscal			-0.030(0.028)	-0.030(0.028)
Indus			-0.033(0.162)	-0.110(0.163)
Market			-0.012(0.009)	-0.018 ** (0.009)
Size				-0.026 ** (0.012)
Lev				-0.725 ** (0.351)
Profit				-0.134(0.330)
Emply				0.025 *** (0.009)
常数项	0.391 *** (0.028)	0.394 *** (0.047)	0.450 *** (0.122)	0.474 *** (0.126)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N	390	390	390	390
R ²	0.061	0.080	0.086	0.14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加入尽可能多的省级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有效减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但是仍然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对结论的干扰。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本文实证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一方面,如果企业税负差异小甚至无差异,税收政策难以发挥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的作用,则税务机关会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针对性地降低某些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过大会影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降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为防止该情况导致的不良后果,地方政府会针对不同企业调整税收征管强度来降低企业的税负不平等程度。考虑到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均与税收征管强度密切相关,税收征管强度可能会对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产生一定的反作用。第二,本文实证也可能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变量问题。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难以全部纳入考虑。因此,为了解决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对于本文实证的影响,本文选取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除企业所在省份外的剩余 29 个省份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得到剩余省份税收竞争均值(Taxc1)和剩余省份财政支出竞争均值(Expc1)。一是基于政策博弈的观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邻里模仿”特征,因此本地区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强度会受到其他地区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强度的影响。二是其余地区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强度对本地区企业税负不平等没有直接的影响,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要求。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对实证模型(1)进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如表 3 第(1)列和第(2)列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强相关,满足成为工具变量的条件,且 F 统计值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如表 3 第(3)列所示,第二阶段的税收竞争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第一阶段(1)	第一阶段(2)	第二阶段(3)
	Taxc	Expc	Inequ
Taxc1	1.301*** (0.280)	-1.662*** (0.696)	
Expc1	-0.447*** (0.123)	0.294*** (0.107)	
Taxc			-0.103*** (0.357)
Expc			0.643** (0.315)
Fiscal	-0.003(0.002)	0.096*** (0.005)	-0.062* (0.033)
Indus	-0.134*** (0.020)	-0.183*** (0.049)	-0.063(0.113)
Market	0.002** (0.001)	-0.007** (0.003)	0.007(0.005)
Size	0.004** (0.002)	0.001(0.004)	0.003(0.009)
Lev	-0.206* (0.108)	-0.305(0.268)	-0.505(0.474)
Profit	0.115(0.195)	0.733(0.484)	-1.117(0.788)
Emply	0.009*** (0.002)	0.019*** (0.005)	-0.017(0.011)
常数项	0.121*** (0.026)	0.148*** (0.045)	0.376*** (0.11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90	390	390
R ²	0.505	0.811	0.483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企业税负的衡量方式。企业税负不平等度量的准确性会对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目前度量企业税负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26],因此不同度量方法下的企业税负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企业在支付税费时,可能存在补交上一年税费和预交下一年税费的情况,本文借鉴刘骏和刘峰的做法对企业税费净支出进行加权平均^[8],采用加权税费净支出/营业收入度量企业税负,并重新计算企业税负的基尼系数。其中,加权税费净支出为企业税费净支出在 t-1 期、t 期、t+1 期的三年移动平均。实证结果如表 4 第(1)列所示,税收竞争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替换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度量方式不会引起实证结论的变化。

2.替换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衡量方式。本文通过变换自变量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测度方法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将税收竞争的测度方法替换为(全国税收/全国 GDP)/(本省税收收入/本省 GDP),将财政支出竞争的测度方法替换为(本省财政支出/本省 GDP)/(全国财政支出/全国 GDP),对实证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如表 4 第(2)列结果所示,税收竞争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

争系数显著为正,变换自变量测量方法不会引起实证结论的变化。

3.使用母公司报表数据。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包含了母公司和子公司总体的纳税情况,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税负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的异地子公司是在异地(非母公司注册地)缴纳税额,此时母公司注册地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异地子公司的税负影响较弱。为排除异地子公司样本对于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尝试使用母公司报表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仍然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综上分析,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替换企业税负不平等的衡量方式、替换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衡量方式以及使用母公司报表数据后,税收竞争仍然显著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仍然显著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这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InequI	InequI	InequI
Taxc	-1.450*** (0.582)	-0.422** (0.218)	-0.646** (0.314)
Expc	0.476* (0.306)	0.387** (0.153)	0.204* (0.116)
Fiscal	-0.106* (0.055)	-0.012(0.026)	-0.045(0.030)
Indus	0.397(0.317)	-0.014(0.016)	0.371** (0.175)
Market	-0.021(0.018)	-0.367** (0.160)	0.014(0.010)
Size	-0.025(0.024)	-0.010(0.009)	-0.019(0.013)
Lev	0.982(0.684)	0.651(0.541)	0.904** (0.378)
Profit	-1.845(1.229)	0.777(0.539)	-2.128*** (0.679)
EmPLY	0.010(0.017)	0.020(0.018)	0.034*** (0.009)
常数项	0.692*** (0.245)	0.891*** (0.123)	0.228* (0.13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90	390	390
R ²	0.202	0.208	0.196

五、进一步研究

(一)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异质性分析

1.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分析。借鉴 Hadlock 和 Pierce 根据上市时间和公司规模两个外生变量构建的上市公司 SA 指数^④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29],该指数绝对值越大,意味着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相比 WW 指数和现金一现金流敏感度,SA 指数具备三点显著优势:一是不包含具有内生性的融资变量,二是计算简便,三是测量偏误较小^[30]。本文按照企业融资约束高低(SA)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两组样本: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和第(2)列所示,高融资约束组的税收竞争系数为-0.297,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0.189;低融资约束组的税收竞争系数为-0.247,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0.156。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显著降低高融资约束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税负不平等影响不显著;而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显著提高高融资约束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税负不平等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逃税和盈余管理行为较多,高融资约束企业内部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本身较高,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努力的行为对其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较大。而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中留存的现金较多,能够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和追加投资,企业不会迫于现金流压力而进行逃税和盈余管理,低融资约束企业内部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本身较低,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努力的行为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较弱。以上分析表明,相较于低融资约束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更大的税收调节空

间。因此,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假设 H3 得到了验证。

2.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本文按照企业所有制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其中,非国有企业组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3)列和第(4)列所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税收竞争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系数显著为正。其中,国有企业组税收竞争系数为-0.352,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 0.228;非国有企业组税收竞争系数为-0.302,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 0.201。由此可见,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原因在于,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和高管身份较为特殊,经营行为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扰。当地方政府采取税收竞争降低税收努力时,地方政府的偏爱使得国有企业整体税收负担下降幅度较大,进而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当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税收努力时,地方政府侧重于加大国有企业税收征管力度的行为使得国有企业整体税收负担上升幅度较大,进而显著扩大国有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假设 H4 得到了验证。

3.基于税种的异质性分析。本文按照税种将企业税负划分为企业所得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并分别测算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和增值税税负不平等。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5)列和第(6)列所示,税收竞争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和增值税税负不平等系数均显著为负;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系数显著为正,对增值税税负不平等的系数不显著为正。其中,企业所得税组的税收竞争系数为-0.541,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 0.272;而增值税组税收竞争系数为-0.349,财政支出竞争系数为 0.176。由此可见,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企业所得税中表现更为明显。原因在于,相比征管较为严格规范的增值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通常调整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努力,且企业逃税主要反映在监管难度较大的企业所得税方面,这使得财政竞争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的作用要大于对增值税税负不平等的的作用,假设 H5 得到了验证。

表 5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税收竞争	-0.297*** (0.095)	-0.247 (0.165)	-0.352*** (0.125)	-0.302** (0.122)	-0.541*** (0.202)	-0.349* (0.187)
财政支出竞争	0.189*** (0.057)	0.156 (0.129)	0.228*** (0.079)	0.201** (0.086)	0.272** (0.127)	0.176 (0.1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R ²	0.302	0.312	0.213	0.224	0.234	0.221

(二)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机制分析

根据实证模型(2)检验财政竞争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的机理,结果如表 6 所示。第(1)列为未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未控制企业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但未控制企业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列为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且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这三列回归结果均显示,税收努力与重点税源企业虚拟变量交乘项(TE×Bi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税收努力对企业税负的促进作用在重点税源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回归结果印证了理论分析,税收竞争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这种影响在重点税源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即税收努力会缩小企业间税收征管强度差异,从而在客观上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进而提高企业实际税负,这种影响在重点税源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即税收努力会扩大企业间税收征管强度差异,从而在客观上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具体分析表 6 第(3)列回归结果,从经济意义来看,TE×Big 的回归系数为 0.008,即税收努力每

变化 1 个单位,重点税源企业的实际税负将比非重点税源企业多变化 0.008 个单位。重点税源企业虚拟变量(Big)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在税收努力不变的情况下,重点税源企业实际税负高于非重点税源企业,这也印证了企业间存在税负差距这一客观事实。

表 6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Taxburden	Taxburden	Taxburden
TE×Big	0.002 ** (0.001)	0.003 ** (0.001)	0.008 *** (0.003)
Big	0.059 * (0.034)	0.088 ** (0.037)	0.089 ** (0.039)
TE	0.035(0.027)	0.043 ** (0.020)	0.049 ** (0.024)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N	14374	14374	14374
R ²	0.053	0.063	0.254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8—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和省级财政数据,探究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作为财政竞争的不同形式,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在采取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替换企业税负的衡量方式、替换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衡量方式、使用母公司报表数据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税收竞争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缩小企业间税收征管强度差异,从而在客观上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扩大企业间税收征管强度差异,从而在客观上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税负痛感除了来自企业税负的绝对水平,也来自企业间的相对税负差距,在出台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以及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重点之一应在于解决税负不平等问题。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偏高是引发企业税负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为保证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应当着力解决重点税源企业税负过重问题,综合施策降低重点税源企业的税费负担。同时,应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地方政府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滥用。短期内,可以适当加大对重点税源企业等高税负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进而缩小同一地区的企业税负不平等,营造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第二,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贯彻依法征税。一方面,进一步缩小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税务机关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常常利用自由裁量权调整税收努力程度,并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策略调整对重点税源企业 and 非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这使得税收努力影响企业的税负不平等。因此,应当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强化对税收征管过程的管理,监督税务人员的征管行为及政企关系,尽量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强化税收征管,减少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干扰。税务机关应当进一步完善金税工程,并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运用到税收征管过程中,确保全面自动记录市场主体的各类交易活动信息,以技术手段来降低在征税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第三,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在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激励下,地方政府热衷开展策略性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因此,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并将依法征税纳入税务机关的考核标准。尽管税收竞争客观上能够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但是同时也会导致税收征管失序。因此,税务机关应当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严格规范税收征管行为,降低地方政府对税收执法过程的干预,以减小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空间,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稳定税源。特别地,应由中央出台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带有一定政策倾斜性地对企业税负进行科学调控,引导地方政府依法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不平等的作用。在财政支出竞争方面,地方政府应当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调整和优化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和支出结构,避免财政支出竞争的无序扩张。与此同时,应当适当下放财权和上移事权以形成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分权格局,并降低转移支付规模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从而减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强度,达到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的目的。

第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在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税收遵从度总体不高,并且通常采取逃税等不法行为以减轻实际税负,这造成了不公平的企业间税负不平等。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一方面,利用信息化技术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与税收自动化程度。当前企业纳税需要承担较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隐性成本,这提高了企业逃税和盈余管理的动机。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税收征管的信息化优势,减少企业纳税过程中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损失,从而提高企业纳税积极性。同时,应加快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税收缴纳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企业纳税的自我遵从度。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奖惩制度来培养企业的纳税意识。全面记录企业的纳税信息,既要为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提供适当的奖励,也要加大对企业逃税等行为的惩罚力度,从而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72260/content.html> 和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73324/content.html>。

②上述事实可由政府文件反映,具体内容详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11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12号)。同时,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布会也指出,中小微企业是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的受益主体,来源于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83925/content.html>。

③具体内容详见《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

④计算公式为 $SA = 0.043 \times (\ln \text{Size})^2 - 0.737 \times \ln \text{Size} - 0.040 \text{age}$,其中 $\ln \text{Size}$ 为公司规模的自然对数, age 为上市时间,即当年年份减去上市年份。

参考文献:

- [1] 吕冰洋.我国宏观税负不高,为何企业感觉负担重[J].人民论坛,2017(7):82—83.
- [2] 倪红福,吴延兵,周倩玲.企业税负及其不平等[J].财贸经济,2020(10):49—64.
- [3] 刘啟仁,黄建忠.企业税负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J].世界经济,2018(1):78—100.
- [4] Lerner, A. P.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onopoly Power[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4, 1(3): 157—175.
- [5] Opp, M. M., Parlour, C. A., Walden, J. Markup Cycles, Dynamic Misallocation, and Amplific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4, (154): 126—161.
- [6] 甄美荣,江晓壮.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6—36.
- [7] 李春涛,郭培培,张璇.知识产权保护、融资途径与企业创新——基于跨国微观数据的分析[J].经济评论,2015(1):77—91.
- [8] 刘骏,刘峰.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4(1):21—27.
- [9] 蔡昌,李蓓蕾.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实际税负比较研究[J].南方经济,2017(11):57—68.
- [10] 孙玉栋,孟凡达.我国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及优惠政策的效应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101—110.
- [11] 汪德华,李琼.宏观税负与企业税负地区间不公平之比较——基于工业企业数据计量分解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5(3):17—29.
- [1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J].财政研究,2016(11):2—18.
- [13] 郭玲.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1):86—97.
- [14] 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J].经济研究,2013(9):99—111.
- [15] 杨龙见,尹恒.中国县级政府税收竞争研究[J].统计研究,2014,31(6):42—49.

- [16] 贾俊雪. 应世为. 财政分权与企业税收激励——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0): 23—39.
- [17] 胡洪曙, 李捷.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J]. 经济管理, 2022, 44(6): 153—171.
- [18] 席鹏辉, 周波. 经济波动、企业税负与环境规制——来自重点税源企业的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21(6): 68—82.
- [19] 王延明. 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3(1): 115—122.
- [20] 李艳, 杨婉昕, 陈斌开. 税收征管、税负水平与税负公平[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1): 24—41.
- [21] 樊勇, 李昊楠. 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J]. 财贸经济, 2020, 41(5): 51—66.
- [22] 田彬彬, 范子英. 征纳合谋、寻租与企业逃税[J]. 经济研究, 2018(5): 118—131.
- [23] 万广华. 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J]. 经济学(季刊), 2009(1): 347—368.
- [24] 唐飞鹏. 省际财政竞争、政府治理能力与企业迁移[J]. 世界经济, 2016(10): 53—77.
- [25] 杨得前. 经济发展、财政自给与税收努力: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税务研究, 2014(6): 70—78.
- [26] 吴祖光, 万迪昉. 企业税收负担计量和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 经济评论, 2012(6): 149—156.
- [27] 陈冬, 孔墨奇, 王红建.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 管理世界, 2016(5): 46—63.
- [28] 邓晓兰, 金博涵.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3): 87—97.
- [29] Hadlock, C.J., Pierce, J.P.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 1909—1940.
- [30] 鞠晓生, 卢荻, 虞义华.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 2013(1): 4—16.

The Impa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on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HU Hongshu LI Jie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he same region bear differentiated tax burden, which increases the pain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0,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on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fiscal competition on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ax competition reduces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increases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 financing constraint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The test of impacting mechanism shows that tax competition increases corporate tax inequality by reducing regional tax effort, and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reduces corporate tax inequality by increasing regional tax effor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olicy suggestions: when formulating the policy to cut tax and fee and make tax preference, we should reduce the inequality of tax burden to reduce the pain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compressing the decision-making space of tax effort, and levy taxes according to law;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loc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normalize tax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curb corporate tax evasion.

Key words: Tax Competition;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Tax Effort; The Inequality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Tax Misery Index

(责任编辑:肖加元)